讲好安康故事 方志里的安康 有奖征文
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 安康日报社 联办

专页

石泉渡口

□ 刘培英

清道光《石泉县志》记载，县城西门外汉水之上有官设的西渡，南门外有商民捐设的义渡，即东渡。1991年出版的《石泉县志》记录了县城有西、中、东3个渡口。在我小时候，汉江边没有桥，从江北到江南，从乡下进城里，全靠船渡，渡口分别在东门河坝、大南门(南门渡)、西关尾子(西渡)。县城往南10公里处，有一处连结川陕南北的莲花古渡，曾担负着入川、进楚、通途关中等地生漆、桐油、木材、蚕丝、棉花的运输任务。渡船不大，仅能容纳10多个人和一些货物。我常常望眼欲穿地等上老半天，渡船到了却因人多坐不下，只好等下一趟。

西关尾子的码头有一艘大船，船的前面可同时容纳4辆汽车，还可载50多人。这船在孩子们眼里无疑是一个庞然大物。孩子们对它充满了神秘的向往，亲昵地把上这条船称为“登船”。“登船”的时间是早上10点至下午4点，所以，过江打柴的我们多半时间是无福消受登船的礼遇。

沿江而上，可达汉中；顺江而下，可达汉口。往来商船极多，大船、小船，满载货物，鼓着白帆，蔚为壮观。逆水行船要靠纤夫，纤夫逢岩爬岩，逢山爬山，腰弯成一张弓，纤绳深深地勒进了肉里，汗水如雨水般顺着脊背往下流淌。大家喊着号子，艰难前行。船行至险滩，连船上的乘客也得下船拉纤。

沿江而下的江南一百里左右，属石泉的南区，也是石泉最穷最偏远的地方，那时没有车路，坐船还要靠运气。20世纪60年代末，在大南门的渡口边，我先是送走了在熨斗镇工作的二姐，紧接着又送走了在长阳乡盘龙村插队的三哥。后来，我自己也悄然登上小船，去区卫生院上班。那时，我们都才20来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码头边，江水上，留下了我们青春的回忆。

夏日黄昏的渡口十分美丽，夕阳如金，洒满汉江。宽阔的江水像流淌着一江的碎金珠玉般璀璨，带着满天的朝霞，带着痴情而绚丽多彩的梦，缓慢，安静。商船扯着白帆，小船上，船夫不紧不慢地摇橹，身上披满金色的霞光。两岸金色的山峦，美得令人陶醉。

夏日傍晚，江边更美。江边的男人少有不会游泳的，他们在江里鱼儿似的欢畅地游着，不时扎着猛子，再从水里钻出来时，手里便拎着一条或大或小的活蹦乱跳的鱼，向岸边的家人扔去。妇女们来到河边，小孩尾巴似的跟在后面。她们把白皙细腻的腿伸进江水，一边与江水亲近，一边拉着家常。

晚风徐徐，波光潋滟，江水清澈，指头大的小鱼小虾在妇女们的双脚和指间肆无忌惮地游来游去，挠得妇人们的腿啊臂啊痒酥酥的。江边的人们不时会听见鱼儿跃出水面的声音，孩子们更是欢呼雀跃，在水边尽情戏水，追逐打闹。

石泉城的江北边是清一色的红石头，呈土红色，老百姓称之为“红石包”，少有沙滩。江南边却是大片大片的沙滩，沙呈白色，由于江水的长期冲洗，沙粒极其干净，洁白透明，晶莹剔透，如盐如雪如玉。

暮色四合，江水静静流淌，江边的小船上点起了马灯，山城也随之亮起了万家灯火。那时，没有电灯，人们大多点煤油灯或桐油灯。渡口旁的人家中，母亲给怀里的孩子讲着故事，孩子枕着江水声，倚在汉江的怀抱里酣然进入了梦乡。

梅子沟的变迁史

□ 喻德余

位于汉阴县城关镇龙岭村境内的梅子沟，发源于龙岭村北端的刺蓬岭，流经中梁上脚下，吸纳桥儿沟沙子窝的小沟汇成溪流，在县城西坛西北角，龙岭村最南端的黄板岩流入月河，全长三公里左右，是龙岭村境内最长的一条溪流，又是紧傍汉阴县城一条美丽而历史久远的小山沟。

梅子沟之名源于何时已无文字可考，据本地老人口口相传，紧邻沟口的大路边，原有几株高大的梅子树，梅子沟因此得名并相传至今。翻阅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两部《汉阴县志》，对源于刺蓬岭的这条小山沟，多记载为“麦子沟”或“糜子沟”，大概是因为梅、麦、糜都是同一个声母，当地的方言中，这几个字的发音基本相同，所以文字记录中会出现一些差异。也可能是因为自清代乾隆年间，原属汉阴县的梅子铺划归原安康县（今恒口示范区梅子铺镇），那里也有梅子沟，为了有所区别才特意改了一个字。但在汉阴当地人的记忆中，因梅子树而得名梅子沟是共识。现在的汉阴县城区地图仍然将位于龙岭村的这条小山沟标名为梅子沟，也说明了梅子沟得名的久远和对这个地名的认同。

闻名遐迩的梅子沟，既有小山沟的幽美，更源于它地理位置的重要。《汉阴县志》(1999年出版)中记载的汉阴古道“月川道”途经县城，北接石条街栈道，西连子午旧道，而梅子沟正是自县城北前往宁陕的出发点。老辈人也说，汉阴县治所迁到新店后，从县城到西安的主要交通要道，是自梅子沟开始，通过龙垭子、双河口、龙王沟到宁陕至西安。这条穿行在秦岭深山的古道，是山城汉阴与省城联系的通衢大路。那时汉阴的土漆、桐油、生丝、天麻、党参、麝香等土特产品，都是靠人工担到省城，县城需要的各种日用杂货，也是靠人们的肩挑背扛，从这条山路运到县城。

在交通极为艰难的过去，不管是骑马的官员还是坐滑竿的商人，他们都一样要和无数的挑夫担客，穿行在这崇山峻岭的山道之中，从县城出发，穿过熙熙攘攘的西坛，进入梅子沟，就踏上通向省城的大道。

那时的梅子沟，沟坎两边绿草茵茵，迎春和野菊映照着路人匆忙疲惫脸庞，潺潺的溪水，吸纳了行人双脚踩起的尘埃。路边几株茁壮的梅子树，花香让行人陶醉，青嫩的果实让劳累的旅人口舌生津。来往匆匆的行人，记住了这几株高大的梅子树，忘不了梅子沟清凉的溪水。

进入梅子沟的大路，过了刘家粉房，听着梅子沟溪流的吟唱，闻着梅子树花儿的馨香，陡峭的中梁上黄泥路，负重的行人不停地打杵换肩，空手的行人也会不停地喘息擦汗。从中梁上到刺蓬岭，上行的小路让远行的人感受到了旅途的艰辛，却也让人满怀对生活的期望。

梅子树是一种能让人看到希望和不畏困难的树，所以才有梅花香自苦寒来和望梅止渴的优美诗句和成语。梅子沟边几株高大的梅子树，虽随着时代变化和风霜的磨砺而成了遥远的过去，就像从沟里通向省城的通商古道一样，时代的发展和自然的风霜已改变了地表的一切，中梁上，刺蓬岭，早已成了老一辈人的回忆。

梅子沟的溪水，始终滋润着梅子沟的山坡田地。数百年来，跟随明清移民大潮迁陕的刘姓家族生活在梅子沟的下半部分，后来的喻姓家族居住于梅子沟的上半部分，两姓移民勤耕苦作，将一条荆棘遍地的小山沟，开垦成能给人温饱的水田和坡地，种植稻麦养猪喂牛，历代梅子沟人在艰难的前行中，寻找生存发展改变生活环境的幸福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梅子沟人组建互助组、初级社、进入人民公社，不断探寻集体致富之路。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梅子沟人响应党的号召，以人定胜天的干劲，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用钢钎铁锤，从观音峡、天星桥、鹞子岩，开凿出东干渠支渠，将观音河水库的清流引入梅子沟，刺蓬岭的山坡上修起了喷灌池抽水站，中梁上的大片坡地安装了喷灌设施。梅子沟的沟沟坎坎修成了层层梯田，那时的梅子沟，春天麦苗幽绿，仲夏稻花飘香，观音河水库的清流，注入了山坡上新修的稻田，喷淋着坡地上的庄稼，梅子沟的梯田、坡地成了旱涝保收的丰产田。

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梅子沟人敢于创新，村民们种果树、开商店、办农家乐、建工厂。在统一规划下，从梅子沟与县城交接处到中梁上脚下，建起了全县闻名的仿古一条街。地面鳞次栉比的楼房，宽阔美丽的街道，熙熙攘攘的行人，川流不息的车辆，梅子沟的大部分，已成了人们观光购物、宜居旅游的特色街区。

乡村振兴的春风，让梅子沟的发展步入了高质量发展快车道。新建的县级幼儿园，孩子们在室外活动场愉快游戏，悠扬的琴声，伴随着幼儿稚嫩的歌声在山沟中飘荡。劳累之余的大爷大妈，在沟畔村部广场上轻歌曼舞，快乐幸福的生活，呈现在村民的欢声笑语中。

曾经在梅子树下吟唱的小溪梅子沟，成了老一代人的回忆，她已和正在建设的县城新街融为一体，展现着无限的远景蓝图和幸福美好的未来。

留在志书里的鲇鱼套

□ 陈平安

白河县境西的五岭山脉，是白河县与旬阳市的界山，海拔1390米，植被茂盛，长年水涵充足，是白河县境内第二大河流冷水河主要发源地，源头支流关帝庙河(今双丰)、朱家河(今朱良)、构檀河(今小沟)在鲇鱼套(今西营)汇合后，自南向北注入汉江。

很早以前，涌急的河水在这里拐了几道弯，逐渐变得文静温柔，河道两边被淤积为浅滩，成了肥沃田地，河湾水草肥美，是水生物的乐园，鱼、虾、鳖等甚多，还喜欢生长一种头大嘴宽，浑身乌黑滑腻的鱼，人们都叫它鲇鱼，称河湾为鲇鱼套。这个名字在《白河县志》(1996年出版)中有明确记载：“清代中叶，河湾称鲇鱼套，后截弯取直，河水改道，河湾淤为耕地。”

而关于“鲇鱼套”地名的由来和截山改河的往事，有两个古老的传说。

听老辈的老辈们讲，鲇鱼套是一条大鲇鱼的化身。说是在五岭山下一个幽冥的地洞中，有条蟒蛇，经过上千年修炼，终成正果。在一个雷电交加、狂风暴雨的漆黑深夜，突然山崩地裂，巨浪滔天，巨蟒从地下冲出，化龙披浪而去。然而，在深山与它一同修炼的鲇鱼精，急着早去东海，趁势同往。但因修炼不足，道行不够，游到这里被大山阻挡，适逢鸡鸣惊扰，只得在此化身隐迹。那回环曲绕的河道如同是鲇鱼扭动的身子，一弯又一弯里婉转流淌的河水，在河湾拐弯处的垭口上喷涌而出，跃下深潭，那是鲇鱼张开的大口，从巨嘴里吐出的激流。垭口两边岩石上长着的老桦树，便是鲇鱼的胡须。

当地还有另一个传说：鲇鱼套截山改河是周朝“周懒王斩龙脉”造成的。传说周朝皇帝“周懒王”昏庸懒惰，不事朝政。他听信游方道士谗言，将可能威胁周王朝的“龙脉”以及“要成气候”的风水灵气之地尽斩。鲇鱼套因颇有灵性，自然也是“被斩”之列。结果，“斩龙脉而断山河”，他的所作所为加速了周朝的灭亡。在我国历史上，“周懒王”考无此人，只有周朝末代君主周赧王的“赧”与“懒”读音相近，秦军攻克东周王城后，他人生最后的时光是在陕西度过的。但历朝历代，只有国家富强稳定，兴盛太平，国库充盈时期，才有精力与财力大兴水利，造福百姓。周赧王是周朝末代君主，在位期间王权已危若累卵，开山改河、兴修水利这种规模的民生工程不大可能去实施。至于民间流传的“周懒王斩龙脉”的故事与他是否有联系，无从考证。

清嘉庆时，白河以地理方位命名，全县划北乡、西北乡、西乡、南乡、东乡和县城，鲇鱼套地属西乡，这可能是“西营”名字的前身。“西营”称呼正式记载是在1911年，以后，西营逐渐取代了鲇鱼套的称呼。

如今，“截弯取直，河水改道”，让“垭口飞瀑”景象早已不再，深潭也被砂石淤填，山环水绕的河湾也没有往日的秀美灵动，只剩下那棵大树还静静地挺立在突兀的岩石上，苍劲盘曲的虬根如大蛇钻入地下。但西营集镇开发，人们建筑打基挖掘至十几米深处，仍是河沙淤泥，从清出的泥沙中发现有类似龟、鳖等动物骨骼，印证鲇鱼套曾截山改河的事实。

根据《白河县志》记载，鲇鱼套截弯取直，有其积极一面，但也给一河两岸人们带来不便。当地人在20世纪60年代前，由冷水河口进西营多在河床卵石间行走，频频涉水过河。1966年修通简易公路，后经多次拓宽，但公路与鲇鱼套仅有一河之隔，每逢洪水季节，对外交通断绝。直到1992年，政府筹措资金22万元，建成横跨50米的西营(鲇鱼套)大桥，才彻底解决几百年来洪涝隔绝两岸的烦恼。

在建设幸福白河的今天，西营镇抢抓乡村振兴机遇，实施高质量发展的洪流中，沿弯而建的田园小区、云逸小区、天逸小区连成一片，楼房鳞次栉比，购物广场、豪华酒楼、商铺宾馆、娱乐场所遍布街巷，镇政府、学校、医院机关单位、企业点缀其间。昔日后高山的鲇鱼套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

方志达人艾文仲

□ 蔡建中

1939年8月，艾文仲出生在湖北郧阳区一家船户家庭。少时为就读改良型的私塾，父母把他托付给在白河水文站工作的伯父，后遂定居河街。曾听先生讲述过童年的琐碎记忆：河街红星桥渡口对岸的湖北郧西老观庙渡口上，是河街“林泰恒”商号建的储油仓库，人称“洋油公司”。仓库为青砖青瓦结构三层楼房，楼房南北两面墙壁上各画有一盒抽出两支的“哈德门”巨幅香烟广告。顺老观庙街向西几十米的山沟进去，有一座叫观音阁的大庙，再进去就是学校。少时，常去河街翰林巷谢馨家聆听其教诲。

1958年艾文仲从安康中学考入西安师范学院地理系。1960年毕业后，分配到白河县第二中学任教。1963年他再次考入陕西师大中文系，1966年毕业后任教于白河县。教书之余，他坚持几十年如一日收集有价值的地方史志和文史民俗资料。一次，他发现学生用谢馨《海月楼诗文杂抄》背面当作业本。于是，就寻迹追购收藏。在日积月累中，他已成了地方史志、文史和民俗领域的“地方通”。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1970年4月，艾文仲被抽调白河县人武部兵要地志办公室工作。1973年底调县革委办，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县文教局副局长、县科委主任。1984年6月，白河县成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并下设办公室，启动新编《白河县志》编修工作。他即担当起为白河人族群记忆修主根谱的历史重任。

在拟定印发县志篇目提纲后，先生带领工作人员到县档案馆，历时3个多月查阅档案2000余卷，并将档案资料分类摘抄制成卡片，与自己积累的10多万字地情资料作为编写县志的基础资料。接着，为弥补白河明清档案毁于战火的缺失，先生带领工作人员到县内乡野广泛采访事件亲历者、知情人，寻访抄录并查考有文字的手稿、碑、碣、题刻等。同时，用信函与各省市和邻近县档案史志机构联系，追索查找和购买交换有关白河的地情资料。其中，在1988年夏天的一次野外调查中，先生带着工作人员索骥来到卡子东坝一村庄。经过一番耐心细致说明来历、目的后，主人母亲才爬上竹片编成的阁楼上，从一个背篓的草木灰中扒出一个油布包，层层打开后一看是本线装32开古书。经先生当场鉴定，《东坝风土人情录》是主人先祖黄弼臣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所著清抄本白河民间地情志书。当提出购买遭主人拒绝后，先生即协商蹲守此家摘抄。先生阅读并摘选，同伴抄，使该书许多重要地情记述录入新志。

在编修新志的艰辛曲折中，资金匮乏一直困扰修志工作。1991年5月县志初稿脱稿，再历经1年多的修改和补充，于1993年1月打印装订成二稿送县审稿。随后，先生将自己修改的县志三稿送到地区方志办进行复审。3个月后，根据地区审稿意见修改完善后的县志四稿被打印成册。

1993年6月，县方志办并入县档案局，先生任县档案局馆长。1994年秋，新编《白河县志》送省方志办终审，并于1995年6月上旬在西安召开终审评议会。尔后，在时任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先生作序等的人文关照以及县长王武杰的重视和督办下，县志下限延至1995年底。

而后，先生带几人蹲守西安办理校对和印刷等事项。新志出版前后，先生还不遗余力地研究推介白河地方史志和文史文化，先后编写和审核《白河县地名志》《白河县广播电视志》《可爱的白河》等部门志和地情书籍，参与白河“三点水”、白河甘蔗酒申报陕西省(安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并获副编审任职资格，当选陕西档案学会会员，政协白河县第四届、第六届委员会委员。

1999年先生退休后曾患中风，恢复后仍致力于地方史志和文史文化的研究、整理和传承，并全力诱掖、引导和鼓励后进者。先生曾对我说：新志成稿后，曾有单位调我到安康工作，我没同意。当时考虑，一是孩子们小，二是我走后白河地方史志和文史资料工作缺了传承人。患病后家人限制先生伏案，但先生仍坚持每天伏案整理2小时。原因如先生所言：我手头积累了几十年的白河地方史志和文史文化资料，若不抓紧时间整理出来，去世后就失传了。而我等后进者凡有请教和编写资料需求，先生都提供思路、资料并给予中肯的指导意见。2009年至2014年，先生结集内部出版《思悟集》《古鍚漫话》，将一生致力地方史志和文史文化研究的思考，以及几十年积累的新志补遗资料，系统的留存给了白河人民。

2014年启动续修《白河县志》(1991--2015)工作后，先生多次给县志办提出续志工作指导意见，并倾囊传授修志经验和方法，为续志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方向和方法指导。2021年1月，先生驾鹤西游、仙逝而去。先生虽离我们而去，但他穷尽一生精力主编的新编《白河县志》，永远成为留存白河人族群记忆的主根谱；他坚守档案史志工作初心的自觉担当精神，他跋涉田野征集访谈、青灯黄卷苦耕不辍等潜心严谨的治学态度，他淡泊名利、诱掖后进的达观和无私，是激励我等后进者坚守史志档案和文史编研平凡岗位发光出彩的精神力量。

从安康方志“特产”篇目说开去

□ 谢谋程

1989年11月，新中国成立后编纂出版的首轮《安康县志》正式发行。是年，参与县志供稿的父亲收藏了一部第1版第1次印刷的首轮县志，当时印刷量仅为1500册。

这部县志成为我人生中阅读的第一部百科全书，似乎也在冥冥中注定了我的方志情缘。大概七八岁的时候，我住在苗圃巷，总是路过林业局，然而身边很多人称其为林特局，这引起了年幼的我极大兴趣：农林水三家的农业局、水利局都很好理解，为什么另外一家却被很多人称为林特局呢？母亲告诉我，以前叫林业特产局。“那现在为什么叫林业局，是什么时候改的呢？”母亲带着我查阅县志，“新中国成立，安康林业仍归建设科管理。1956年9月1日撤销建设科，成立安康县农林水牧局。直到1972年10月20日，始将林业分出，专设林特局。1984年2月28日，安康县林特局改称安康县林业局。”这当是我读志用志的开始，对安康特产充满兴趣的开始。自上大学离开安康后，见到安康的老乡格外亲切，安康特产也成为我寄托乡愁的特殊载体。

安康到底有什么特产呢？从汉滨区的角度，首轮县志第八篇“蚕桑丝绸”，应当属于“凡在全国或全省有影响的，可以升格设编”的篇目设置范例。记得有首歌《安康是个好地方》，最后一句是“金州城的丝绸呦，畅销欧美呦，安康人民的生活幸福万年长”，蚕桑丝绸与平利绞股蓝、紫阳富硒茶、安康水电站等并列，也是首轮《安康地区志》“特产”编第一章的标题，可见其作为安康特产的代表性和重要性。

通过查阅首轮志书《安康地区志》和二轮志书《安康市志(1991-2013)》，目之所及，从汉滨区到全市，才发现原来安康的特产如此丰富，除了歌里唱到的，还有生漆、油桐、魔芋、烟草等等，让我从中看到了故乡特色生态产业的壮大与繁荣。特别是富硒食品，除了紫阳富硒茶外，魔芋、绞股蓝也是富硒的，又开发了富硒山野菜、魔芋方便食品、富硒矿泉水、富硒大米、饮料酒、富硒食用油等，都值得我们在外游子细细品味，多多宣传。

对比两轮志书的篇目设置，还可看出安康特产及其相关产业的变化发展情况。《安康地区志》第六编为“特产”，下设“蚕桑”“茶叶”“生漆”“油桐”“药材”“其他特产”六章；二轮志书《安康市志》第十编为“特色产业”，下设“富硒食品”“茶产业”“蚕桑产业”“魔芋产业”“烟草产业”“中药材产业”六章。两轮志书“特产”相关篇目均单独列章记载茶叶、药材(主要是中药材)、蚕桑及与这三类的相关产业。由此观之，1991年以来，与这三类特产相关的产业链已较为成熟，现发展为安康重要的特色产业；首轮志书“其他特产”所涉及的魔芋、烟草，已发展为安康市域重要的特色产业，在二轮志书中亦做到单独列章；而首轮志书曾单独列章记载的“生漆”“油桐”在二轮志书中少有记载，取而代之的是新增的“富硒食品”。安康被誉为“中国硒谷”，位于全国面积最大、地层最厚、最宜开发利用的天然富硒带，中高硒土壤占全市总面积的81.87%。将“富硒食品”置于特色产业编首章，正是安康富硒产业从莽莽深山走到聚光灯下，逐步成长为安康生态经济发展“挑大梁者”地位，在史志记载上的生动体现。

两轮志书“特产”相关篇目设置的变化，正是安康与祖国一起成长，与新时代共同进步，经济体制不断改革，行政区划日趋完善，群众生活从温饱不足迈入基本小康，城乡发展从闭塞落后走向多元开放的忠实记录和生动展现。

正如两轮市级志书中反复提到的，安康作为陕西乃至西北地区山货特产的重要产区，拥有“丝绸明珠”“中药材摇篮”“漆茶耳倍之乡”等美誉。在特色产业发展方面，我们应更好地发挥志书记载的“地球上难得的土壤富硒且易被植物吸收的富硒区域，是中国三大富硒区之一”的优势，用好茶叶、蚕桑、魔芋、烟草、中草药等传统特色产业和绿色禀赋，打造更多令安康人民骄傲的品牌和名片，服务乡村振兴，促进工业增长。

紫阳籍明代尚书双杰

□ 胡继武

在明代，有两位兵部尚书——魏学曾与刘四科，他们的传奇人生与籍贯之争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魏学曾，明代陕西金州紫阳县民籍，西安府泾阳县人，明朝大臣。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进士，初任户部主事，后升迁为郎中、光禄少卿、右佥都御史等。他巡抚辽东时，曾镇守山海关，使京师免受外敌侵扰。后又调整将领和官吏，招降附和，发展屯田，屡破敌军，晋升为右副都御史，后任南京户部右侍郎。万历十九年(1591年)，任兵部尚书，总督陕西延宁甘肃三边军务，因军功加为太子少保。万历二十年，因宁夏之役应变不力被革职，数月后得以洗冤，官复原职。万历二十四年去世，享年72岁，天启三年(1623年)追谥“恭襄”。

刘四科，明代陕西金州紫阳县军籍，西安府泾阳县人，明朝大臣。隆庆五年(1571年)考中进士。他初授山西长治县知县，后升任吏部主事、考功郎、文选郎、太常寺少卿、太仆卿等职。在顺天巡抚任上，刘四科整饬蓟州兵备，兼巡抚顺天等处地方，有效提升了边疆地区的防御能力。他关心民生，严查男丁服役欺诈冒顶之事，赢得了百姓的广泛赞誉。他曾以战抚之策，成功遏制了北方边患的持续恶化，后晋兵部尚书。万历三十八年，刘四科卒于任上，死赠太子少保，赐谕祭葬。

魏学曾与刘四科，一位在辽东建功立业，一位在顺天守护边疆，他们虽然身处不同的地域，却都在明代政坛上颇有建树。但在不同的史志资料中，关于他们到底是紫阳人还是泾阳人却有不同的记载，这与当时的户籍管理制度和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

明代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登记需追溯祖籍，而士人实际居住地常因家族迁徙与仕宦流动发生变化，形成“户籍”与“乡贯”有差异的情况。

明代《进士登科录》中，则因朝廷为防止“冒籍”参加科举，规定考生必须回户籍地参加考试，而要同时详记“户籍”与“乡贯”。例如，《进士登科录》载：“魏学曾，贯陕西汉中府金州紫阳县民籍，西安府泾阳人”“刘四科，贯陕西汉中府紫阳县军籍，西安府泾阳人。”表明二人家族的户籍分别为紫阳县民籍、军籍，但都已定居泾阳。

而在古代官修地方志中，一般会在“选举”篇记录进士、举人的户籍，但涉及人物入仕以后的生平，多数由其所在的乡贯地作详细记述，这样既尊重了历史事实，又可通过名人效应构建地方文化认同。例如，虽然只有《泾阳县志》详细记载了魏学曾、刘四科的生平，但二人及其家人以紫阳县的户籍身份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况，是在泾阳、紫阳的地方志中均有记载的。“魏学曾，中紫阳县学癸丑进士”“魏学思中紫阳学北直真定府同知”(魏学思是魏学曾的弟弟)，以及“刘四科，中紫阳县学辛未进士。”这些与乾隆《兴安府志》《重修紫阳县志》等地方志的相关记载是一致的。

所以，若从当时的科举制度及进士身份上看，把魏学曾和刘四科作为紫阳籍人物来记载和宣传是没有问题的。从文献资料来看，紫阳县对这两位杰出人士非常敬重。《续修陕西通志稿》等志载：“紫阳县有制三边魏学曾兵部尚书刘四科等昭忠节孝祠在大明寺址。”康熙《紫阳县志》载：“紫阳明代天官少宰坊为吏部侍郎魏学曾立、起鳳坊为进士刘四科刘宇曜立。”

乾隆《兴安府志》及《紫阳县志》等地方志均载有魏学曾撰写的《三河平贼记》，落款为“邑人”。另外，《紫阳县志》还收录有刘四科撰写的《乾沟平贼记》《紫阳知县邓公去思碑》以及魏学曾撰写的《紫阳知县周公德政碑》，他们在这些文章的落款处都自称“邑人”，也就是同一个县的人。可见，他们不仅以紫阳籍入仕，还公开以紫阳县人的身份，撰文记录当地官员平贼安民的重要功绩，并为紫阳知县撰写德政碑。

我们通过深入研究他们的生平事迹，不仅能更好地理解历史，还能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让这份共同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